

Collective Actions in Industrial Clusters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林 涛◎著

活力四射的产业集群从哪里来？不是理论预测出来的，也不是一厢情愿打造出来的，更不是单纯靠资源、区位等条件而自动形成的，而是民众不懈奋斗与协同创造的结果。命运掌握在参与集群实践的广大民众手中，而掌握命运的钥匙正是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Collective Actions in Industrial Clusters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林 涛◎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林涛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03-026902-7

I. ①产… II. ①林… III. ①产业经济学-研究 IV. ①F06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6759 号

责任编辑: 宋 旭 陈 超 刘希胜/ 责任校对: 宋玲玲

责任印制: 赵德静/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深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1/4

印数: 1—2 000 字数: 284 000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立足中国集群实践的 理论超越

代序

本书是王缉慈主持的历时四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 40535027)的主要成果之一, 又是此前本研究团队一批相关研究成果的继续^①。这次同时出版的书有三本, 包括《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王缉慈等著)、《全球化、集群转型和创新型企业》(梅丽霞著), 以及《产业集群合作行动》(林涛著)。这三本书的目的, 是既要超越国内对产业集群的种种思维定式, 又要超越国外不完善的产业集群理论的神话。

在全球经济竞争中, 地方创新环境凸显为区域成功的关键。美国硅谷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中小企业信守的竞争合作规范, 以及美国好莱坞的企业间在合作项目中体现的网络关系, 成为当地独特的创新环境的根基, 使企业成功地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根据研究, 这种创新环境是在产业集群(简称集群)中形

^① 2001年以来, 本研究团队撰写的相关论著还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王缉慈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创新网络——区域发展的新思维》(盖文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浙江产业群》(朱华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年)、《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张辉: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与集聚》(贺灿飞: 科学出版社, 2008年)、《中国制造业区位: 产业差异与区域差异》(贺灿飞: 科学出版社, 即将出版)、《花卉业的全球化和地方集群创新》(杨锐和李萍: 中国城市出版社, 即将出版), 以及《外向型发展模式、地方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增长》(张晔: 2008年博士后出站报告)等。本研究团队还翻译了[美] Karen R. Polenske(普可仁)主编《创新经济地理》(童昕, 王缉慈等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等。

成的。集群是基于地方的具有专业化特征的生产系统或创新系统。一些同处或相关于特定的产业领域的企业和机构,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在地理上靠近并相互联系和合作,会形成独特的地方创新环境。由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集群(cluster)和群聚(clustering)或集聚(agglomeration)等词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外区域研究的文献和区域政策的文件中。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集群”迅速成为有极大诱惑力的时尚概念。

对集群研究的参与是多学科的、跨学科的。以波特(M. Porter)^①、克鲁格曼(P. Krugman)^②和别卡提尼(G. Becattini)^③为代表的大批学者发现,企业倾向于在特定区位集聚,不同的相关活动集聚在不同的地方,产业集群和地方专业化同时存在。集群研究突出了地理区位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性。集群理论的脉络包含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派,有强调技术与制度互动的区域创新系统研究,与分工、外部性和报酬递增一脉相承的空间经济学研究,运用社会网络方法所进行的产业组织和创新网络研究,以及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研究等。它们不约而同地重新审视了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提高综合国力的作用。

对集群实践与政策的关注是世界性的。从1999年开始,欧美国家实行了集群战略(cluster initiative, CI,或译为集群动议),促进区域内的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形成伙伴关系,以推动集群的发展。2003年美国竞争力研究所和瑞典创新系统机构联合,对200多个CI和一些集群实例进行调研之后,发表了绿皮书^④,论证了“集群动议绩效模式”(cluster initiative performance model)。2004年美国竞争力研究所又与知识经济和企业发展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Knowledge Econom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发表了集群政策白皮书^⑤。此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联合

① 参见 Porter M. 1998. Cluster and the new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7~90.

② 参见 Krugman P. 2000.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Clark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9~60.

③ 参见 Becattini G. 1990. The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as a socio-economic notion. In: Pyke F, Becattini G, Sengenberger W. Industrial district and inter-firm co-operation in Italy.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31~57.

④ 参见 Orjan S, Goran L, Christian K. 2003. The Cluster Initiative Greenbook. The 6th Global TCI Conference.

⑤ 参见 Andersson T, Serger S, Sorvic J et al. 2004. The Cluster Policies Whiteboo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Knowledge Econom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纷纷发表研究报告, 力图推动集群战略和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 集群的概念也因此向广义拓展。

根据发展中国家广义的集群概念, 在我国很多省、市都可以发现发育程度不同的集群。集群创造了“世界商品中国制造”的奇迹, 培养了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然而, 在现阶段, 我国集群的大多数 (包括高新技术的) 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其中一些集群或面临衰退, 或受国际资本控制, 其走向创新的道路值得政府尤其是科技部门的充分重视。

我国的集群实践、研究和政策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①, 遍布十几个城市的研究者在各类课题的支持下对集群进行了很多调研, 撰写了大量论著。此外, 不少省、市政府都制订了各自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但是, 在我国的“集群热”中, 理论研究支撑仍然不足, 政策也存在偏差的风险。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地方政府文件和新闻报道陷入某种盲目状态。

21 世纪初开始, 国外一些学者逐渐对集群进行反思。2003 年, 英国学者马汀和森雷 (R. Martin and P. Sunley) 以《解构集群: 混乱的概念还是政策万能药?》为题, 发表了抨击波特的文章^②。接着, 关于超越集群的呼声越来越高。瑞典学者梅尔伯格 (A. Malmberg) 以《超越集群: 地方环境和全球联系》为题撰文, 分析了加强全球联系对区域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意义^③。2005 年澳大利亚举行了以“超越集群: 目前的实务和未来的战略”为主题的学术会议^④。在主旨报告中, 来自美国的罗森费尔德 (S. Rosenfeld) 引用门肯 (H. Mencken, 美国新闻编辑和语言学家) 的话——“对于每个复杂的问题有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简单的、灵巧的、错误的办法”^⑤, 并强调, 集群是经济的生态系统而不是会员组织; 集群是培育起来的, 而不是发布出来的。与

① 我国的集群研究和集群政策可追溯到 1999 年仇保兴的著作《小企业集群》的出版, 2001 年王缉慈等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一书问世, 2000 年王缉慈在浙江省民营经济论坛上“从意大利产业区模式看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发展前景”的讲话, 2002 年底中国软科学协会“产业集群 (簇群) 与区域创新发展”宁波会议, 以及 1999 年广东省科技厅对专业镇的政策扶持。

② 参见 Martin R, Sunley P. 2003. Deconstructing clusters: Chaotic concept or policy panacea?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3 (1): 37~56.

③ 参见 Malmberg A. 2003. Beyond the Cluster—Local Milieus and Global Connections. In: Peck J, Yeung H. *Remaking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45~159.

④ 参见 Stuart A. 2005-6-30. Rosenfeld: Beyond clusters: current practices & future strategies. Ballarat, Victoria. http://www.cric.com.au/cric_cluster/index.php.

⑤ “For every complex problem there is a solution that is simple, neat, and wrong.”

此同时,超越硅谷^①、超越好莱坞^{②,③}的论著也已面世,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硅谷和好莱坞等创新的和创意的集群会在地球上出现,希望读者特别关注集群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去盲目地“打造”。这些论述都告诫我们,需要冷静地反思集群,破除关于集群的神话(myth)、神秘(mystery)和“忽悠”(hype)。

我国的集群研究也已经到了必须“超越集群”的时候。目前国内关注产业集群,基本上只是“打造产业链”和“打造产业集聚区”,追求的还是降低成本、招商引资和规模扩张,追求的还是GDP、出口创汇等短期收益,甚至是在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下发展“工业地产”、“文化地产”或“科技地产”,而不是技术学习、创新和创造。这与国家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是相矛盾的。真正的产业集群理论的价值,恰恰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创造国家竞争优势。

《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从多方面论述了集群的概念特征,以全球化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的产业集聚地理格局和集群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产业集聚是一个中性词组”的观点,并主张,要超越只依靠低成本和规模扩张“打造产业链”和“打造产业集聚区”的做法,超越集群内“共同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必然促进企业合作”的命题,超越“集群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逻辑,超越“集群必定是创新的空间”的思维,超越从“集群经济”层次理解集群的高度,超越把集群作为静态的产业组织形态的认识,超越把集群看作封闭系统的思维,超越仅用发达国家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思维。因此,需要培育真正的创新集群,使集群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练兵场和国际竞争力的源泉。

《全球化、集群转型和创新型企业》则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分析了全球化波动的特征与根源,提出了我国传统产业的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模式,并通过天津、深圳、苏州等地自行车集群的实例,说明集群转型(包括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取决于其本土创新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以及集群内企业的协力合作。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则摆脱了对集群概念标准讨论的依赖,进而密切关

① 参见 Bresnahan T, Gambardella A. 2004. Building High-Tech Clusters: Silicon Valley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 Frick C. 2008. Beyond hollywood: Enhancing heritage with the 'orphan' fil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4 (4): 319~331.

③ 参见 Langford B. 2005. Film Genre: Hollywood and Beyon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注现实中集群的作用。集群的作用并不能自发形成,也无法简单归结为经济外部性,而是通过主动的合作行动实现的。合作行动是实现集群效应、提升集体效率的关键。该书系统地考察了集群的合作行动,包含目标体系、主体的能动作用、合作行动模式与规划等。

这三本书在研究视角、概念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并不统一,而是各具特点,相互补充。与笔者2001年的专著《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相比,《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在理论综述方面省去了很多笔墨,尽量深入浅出,减少枯燥的教条,增加生动的实例,可以作为入门读物。《全球化、集群转型和创新型企业》在全球化波动和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方面着墨较深,并力图把一个产业(自行车产业)的创新道路说透,对于其他产业的寓意是需要仔细回味的。《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则可望对集群的发展实践提供帮助。尽管该书的理论性比较强,但这正是我国制定集群政策时所需要参考的。只有在理论上把行为主体的合作行动论述深透,才能正确地去实践。后两本书正好补充了《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一书在文献综述,以及在集群政策和规划方面论述的不足。总体来说,这三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寻找产业集群发展和升级的具体的“药方”,而且是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和决策者继续探索,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中寻找中国特色的集群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产业集群研究团队,由王缉慈、贺灿飞和童昕三位教授(副教授)领导。先后参加研究和写作的共有19人,其中,王敬甯、李鹏飞、潘峰华、陈平、马铭波为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其他作者都已经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是梅丽霞、林涛、张晔、谭文柱、陈倩倩、刘褊、宋加平、任宝、李萍、姜冀轩、朱兰等。

三本书在研究、调查、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很多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由于时间、精力和水平所限,书中肯定会存在不少缺陷甚至错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正当三本书进入编辑的阶段,欣逢盛世、共襄盛举,我国成功举办了国庆60周年的系列活动。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祖国,祝愿她更加繁荣昌盛。

王缉慈

2009年10月

产业集群在全国各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学界的相关讨论有泛滥的趋势，一些地方政府关于产业集群的政策和规划也有出现偏差的危险。本书无意过多展示中国集群发展的成就，而是想指出，当产业集群的理论泛滥的时候，整合产业集群理论、批判地看待集群实践与研究、提升产业集群研究的真正契机也就到来了。当然，这也是极为困难的。

许许多多关于“集群”的概念在现实中误用、乱用的案例不断呈现。如何批判地看待这一似乎不甚合理的情况，关系到集群研究的信心与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把握。确实，有些研究者开始陷入不安之中，甚至黯然断定集群研究已经走到尽头，猜测探索新的学术名词的时候已经到来。这种不安或许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自认为严谨的概念竟然被现实中充满活力的地方政府、企业等无意甚至刻意地误解，以服务其实际需要——学术的严肃竟然如此不堪！二是自认为科学的理论竟然在指导现实操作方面难以有所作为，而一旦作为，则偏差极大——学术的用途竟然如此虚弱！这里，我们应该把思维转变过来，勿将原因过多归咎于地方的误解与误用。当集群研究与各地产业发展实践相脱节的时候，出问题的未必仅仅是那几位不小心误用概念的政府写手，或者是那几位语焉不详的所谓专家，所有集群研究者本身也是难辞其咎！集群研究跟集群实践本身，也许天生就有些偏差存在。

与其说集群研究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理论建树，倒不如说集群概念是对现实区域产业发展理想的描述。集群的各种概念特征的研究描述了这种理想的状态，并常常对全球最优秀、最典型以及最理论化的区域产业发展案例加以说明。集群概念特征具体指导着、寄托着各个地方人们的产业发展梦想。这些特征大概可以归结为产业集聚、产业联系与创新系统等多个维度。为了发展出这些维度，集群研究者走过了极为艰辛曲折的认识过程。相关的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本书审慎地认为，这些集群特征的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倒不是说这些特征概括得不完善、不严谨或是不明确，而是每一个具体的地方产业发展，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都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者们也许给出了未来的理想格局，但对于如何到达理想的彼岸，却仍是见仁见智、混沌不清。当我们确立集群实践是终极的研究指向的时候，每个地方产业发展如何达到集群的理想状态，就成为必须直面的研究问题。

在理想特征的召唤下，很多地方的集群实践，都是在努力地推动地方发展朝向理想状态转变。这种精神固然可歌可泣，但是却往往受制于这些理论特征，为集聚而集聚、为联系而联系、为创新而创新。无论是建设工业园以促进产业集聚、打造产业链以促进产业联系，还是建设创新中心、创新网络等以推动地方创新体系的形成等，都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这样全国范围地打造产业集群，在规模、力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是，那种理论脱离了实际的教条主义以及与浮夸风气相伴的形式主义，依然在集群实践中俯拾皆是，给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这不由得让人痛心。借用中国革命的话语方式来说，只有集群理论结合中国的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方能够找到中国特色集群建设道路！不然，集群理论则只有被束之高阁的唯一前途。

也许集群研究太把集群概念本身当回事了，而检验集群研究与理论本身的标准也是空缺的。国内研究者经常以能否在国际、国内高等级刊物发表研究成果为标准，来指导集群研究。大多数人在评判集群研究时，常将学术目标的重要性，凌驾于现实的丰富而多元的集群实践性之上。集群最重要的特点恰恰在于它鲜活的实践特征，随时随地在神州大地以各种具体、丰富而独特的方式展开。脱离集群实践的集群研究，再辉煌也注定会被误用和滥用，并逐渐被发现其无用！对具体的集群发展来说，无论过去曾经是怎样的辉煌或是黯淡，建设集群都必须落实为具体各级政府、各种类型企业、不同的科研机构与学校等实实在在的实践过程。从集群实践意义上讲，所有的区域都是存在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衰落的威胁的。集群实践必须时刻注意抓住新的发

展机遇并防止衰退等正反两面的具体问题，而非单纯建设理论预测的集群概念标准。本书强调，重新发现集群实践的重要性，是中国产业集群研究得以新生的关键所在。从集群概念转向集群实践，是集群研究批判与升华的必经之路。在集群理论泛滥的年代，关心热爱集群的人们必须有勇气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集群研究必须有能力为全国的集群实践提供体系性与可操作性的支持。

让我们回到集群实践本身。当报道神州大地的某处出现一个集群时，其实际的含义是对某地的某产业发展情况较好的一种确认。当政府说此处有某某集群时，实际的含义是希望此处的某某产业能够获得“集群神咒”的祝福，在一瞬间获得超强的竞争力。而当学者讨论到集群时，基本上是围绕某地某产业的相关事物进行讨论。不同领域人们对于集群的理解能够得到的共识是，集群跟空间及产业两种特征相关。空间特征大概是地方尺度，相当于我国的镇级行政区乃至县级行政区的大小。产业特征以细分产业乃至产品层次为特点，如制鞋、花卉、汽摩配等。集群实践，正是一个地方相关主体针对具体的某一个产业发展的所有思想与行动之和；“集群”一词描绘的是与地方产业发展相关的各种事物的总和。而集群实践的核心议题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的具体产业发展，如何通过各种现实主体的实际努力，实现充满竞争力的发展壮大。

这样的概念分析，实际上表达了对已有理论的双重不满。一是只刻画理想集群的特征，却难以指明理想特征对具体一个地方的意义，以及达成理想特征的有效实践方式。二是只刻画典型的集群主体^①，却未能根据实际相关人员如地方政府官员、协会秘书长、地方企业老板的特点，来提出他们所能理解、所能操作的集群发展方式。集群研究在现实中受到诟病最多的，大概就是它的“可操作性”。当可操作性成为集群研究的核心时，那些到底有没有集群、是不是集群、集群的特征到底是什么等问题，在一瞬间也自然而然地退居二线。像理想集群一样地发展，关系每个地方产业发展的权利与现实可能性。研究者也好、政府官员也好，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去根据地方产业的区位商小于1等指标，直接宣判地方产业发展根本不是集群，更不能宣判这个地方的未来发展就不能借用集群的思路来提高效率、获得竞争力，并实现发

^① 如政府应发挥什么作用、企业应发挥什么作用的理论设定，仿佛这一切在现实集群中就如同上帝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一样。现实集群中不同主体的作用与分工是在长期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不能直接用理论模式来断然评判。给发展建议的时候同时也要考虑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主体特征。简单套用理论对现实集群来说不啻于灾难。

展的可持续性。从人本与道义的角度，集群理论应当承认，不同地方的具体产业发展存在着不断改进与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地方产业的相关主体有可能借用集群理论的观念与方法，来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经常发现，相当多的地方集群发展往往因为是落后地区及边缘地区，是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内资民营企业、粗放型发展模式，而被人为地剥夺了发展的资源与条件，受到了各种歧视与不公平待遇。更可怕的是，被边缘化与歧视的地方产业主体本身，认同并受制于这些偏见，最终或放弃了奋争的雄心，或挣扎于现实的泥淖中。这未免让人痛心。本书对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的探讨，希望能够消弭区域偏见、产业偏见、企业规模偏见、资本来源偏见、技术能力偏见等对集群发展的损害，真正关注到在全国各地奋争谋生的民众的愿望与能力，帮助他们去实现区域产业发展的目标并增进其福祉。这实际上是对打破区域产业发展宿命论的一种尝试。笔者深信，区域产业的发展命运掌握在具体参与集群实践的民众手中。如何运用合作行动的方法去汇聚力量，众志成城，关系集群实践的目标能否最终实现。

坦率地说，关注集群实践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研究者暂时忘记自己论文撰写的紧迫、职称文章发表的昂贵、学术地位运作的艰辛，而去真正关注现实中的、也许不符合“集群”概念的“集群”，以及集群中的人需要什么和到底怎么做。按照经济地理学的人本关怀宗旨，我们在集群实践中可以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与每个集群中地方产业发展相关的人民群众那种热切的发展愿望，为获得更好的生活，以及更为光明的未来的那种奋争谋生之心；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些最可爱的人由于环境限制、发展基础限制、教育启蒙阶段限制、信息交流条件限制、制度与传统限制等，在奋争谋生的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磨难，并承担了艰巨而繁琐的各种现实的发展任务。

因此，集群实践有两大任务：一是理解、激发与呵护集群中全民创业、创新并追求理想生活之心；二是破除集群发展障碍，梳理发展限制，为进一步的发展积累基础条件。而这两大任务是在以区域产业发展为平台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而且动态地处在可改进与未完成的状态中。集群实践强调的，是区域产业利益的公共特点与整体环境。这样的要求，靠单一的主体是很难胜任的。此时，集群中的合作行动就成为理解集群实践的关键所在。

简要地说，产业集群中的合作行动，指产业集群中的各种类型的主体如政府、企业、协会、创新中心、学校等为了产业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集思广益并合作推动各种具体的集群建设措施的落实。从这个

角度上讲,合作行动是集群实践的微观实现方式,也是实现各种理论上宣称的好处的具体操作方法,同样也是集群特征得以整体呈现的微观机制,更是落实集群可操作性的必经途径。

集群中的合作行动研究以集群实践为依托,重点考虑可操作性问题。

首先,可操作性必须面对集群当中不同层次、不同主体间错综复杂的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有可能是企业自身的产品开发与市场运作、政府的行业管理与政绩诉求、本地人的就业意向以及消费愿景,甚至民众的生态保护需求等。集群实践关注区域产业发展的公共利益,与其他层次目标密切相关,但关注的焦点又有不同。对集群实践相关的目标体系的梳理并明确相互衔接关系,则是明确可操作性的前提要求。

其次,集群实践的可操作性要求深入研究行为主体的行为愿望、能力与行动等,而这对于具体的每个集群来说又是存在巨大差异的。理解集群实践中相关主体的能动作用发挥的机制,了解不同主体在集群中的作用、功能以及利益诉求、协调机制等,方能在集群实践的可操作性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在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根据地方与产业特点,地方政府、企业家、协会会长等,甚至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宗族族长、创新中心主任等都会在实际的集群实践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此时并非理想化的、要求具体的某类主体去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强调集群应根据地方特点与产业特点,形成独特的共同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合作行动机制,调动相关利益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主动性以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再次,集群实践的可操作性必须考虑系统影响。集群中的合作行动不可能一相情愿,它是在与社会经济的密切互动中达成的。在防止合作行动不足的同时,也应防止过热与盲目的合作行动。因而,在强调相关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同时,应加强对集群实践的系统性的分析判断。选择错误的时机和切入角度的合作行动,尽管动机良好,但是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在一些典型的集群发展案例中,总能够发现一些抓住历史机遇、考虑系统影响的合作行动,如根据需求创建市场大厦、完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成立商会、推进企业国际化运作等。由于系统性的影响,合作行动成功的模式总是具有独特性的。但是当某些地方可操作的合作行动模式简单复制到其他集群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偏差。此时,如果未能及时统筹考虑,则合作行动失败的概率极高。抓住集群实践系统性的作用机制,来进行合作行动规划,正是在集群实践中尽量减少盲目性,增强合作行动落实的可操作性。

总之,本书观察到,现有的集群研究过于注重概念特征的理论论证,而

对集群实践的观察与支撑远远不足。因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本书强调集群实践的要求是可操作性，而核心支撑与微观机制则是产业集群中的合作行动。为增进对产业集群中的合作行动与可操作性要求的结合，本书选择合作行动目标、集群主体能动作用、合作行动系统性三方面作为重点讨论的角度，并提出产业集群合作行动规划的可能性与参考途径。因此可以说，批判集群理论、关注集群实践、推进合作行动是本书的三个主要着眼点。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06～2009年）的主要成果之一，也得到了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基于合作行动视角的协同创新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专业镇为例”的支持。主要观点的研究基础来自于笔者的博士毕业论文《产业集群中的合作行动研究》，并在笔者工作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提炼。笔者及所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产业集群研究团队对以广东、浙江等地为代表的全国产业集群发展有着长期的关注。工作之后，笔者更是结合广东专业镇建设发展的实际，对集群实践经验进行了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辨。应该说，集群批判、集群实践与合作行动的奋斗方向才刚刚开启，未来的集群研究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需要我们去不断探索。

林 涛

2009年10月于广州

目 录

立足中国集群实践的理论超越（代序）	i
-------------------------	---

前言	vii
----------	-----

1 第一章 开展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研究	1
---------------------------------	----------

第一节 为何要关注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2
-------------------------	---

一、现实对合作行动研究的需要	2
----------------------	---

二、合作行动研究关注的重点	6
---------------------	---

三、合作行动研究的理论意义	8
---------------------	---

第二节 研究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的思路	9
-------------------------	---

一、研究目的	9
--------------	---

二、研究内容	10
--------------	----

第三节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研究的方法	11
-------------------------	----

一、理论建构方法	14
----------------	----

二、资料分析方法	18
----------------	----

三、观念数据的研究方法	20
-------------------	----

四、系统动力学方法	24
-----------------	----

参考文献	27
------------	----

2 第二章 合作行动：产业集群理论的核心	31
-----------------------------------	-----------

第一节 产业集群研究重心的转换	32
-----------------------	----

一、外部性概念辨析	33
-----------------	----

二、集体效率与合作行动	37
-------------------	----

三、从集群概念到集体效率的研究重心转换	39
---------------------------	----

第二节 集体效率概念的理论拓展	43
一、柔性专业化学派	44
二、加利福尼亚学派	47
三、“黏性地方”学派	50
四、创新环境和创新网络学派	51
五、新经济地理学派	53
六、竞争优势学派	54
七、全球价值链学派	56
八、集体效率概念的理论拓展	57
第三节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的定义与分类	59
一、合作行动定义与类型的已有研究	59
二、对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类型的讨论	61
三、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的定义	63
第四节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的相关研究	64
一、合作行动与全球联系	64
二、信任、社会资本与合作行动	66
三、集群合作行动中的行为主体与问题解决	67
本章小结与讨论	70
参考文献	70

3

第三章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目标研究

第一节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区域产业发展目标	79
一、产业结构升级	80
二、劳动地域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	81
三、从企业角度思考区域产业发展目标	83
四、集群研究中的区域产业发展目标	85
五、区域产业发展目标的讨论	85
第二节 区域产业发展目标与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目标的建构	87
一、区域产业发展目标层次的实际思考	87
二、区域产业发展目标层次的划分	88
三、区域产业发展目标	91
四、产业集群合作行动支持各层次目标实现	95

第三节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对企业层次目标的引导与协助	99
一、企业要素成本目标的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协助	102
二、企业经营效率目标的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协助	103
三、企业差别化定位目标的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协助	105
第四节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对区域层面目标的协调	106
一、人与自然关系协调	107
二、人际关系协调	108
三、政府效率改进	108
四、环境保护与整治	109
第五节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对集群层次目标的支持	111
一、本地经济效率提升的合作行动支持	111
二、本地创新效率提升的合作行动支持	115
三、外部联系中的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119
本章小结与讨论	127
参考文献	128
4 第四章 产业集群合作行动的主体能动作用分析	131
第一节 产业集群中主体能动作用的重要性	132
一、人文地理学对人类能动作用的讨论	132
二、产业集群主体能动性概念的提出	136
三、产业集群主体能动性的现实表现	137
第二节 从主体能动作用建构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140
一、主体能动作用的构成分析	140
二、主体能动作用的实现方案	146
三、集群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与合作行动	147
第三节 现实主体参与合作行动的能动作用	147
一、惯例型与突变型产业集群合作行动	147
二、合作行动中的企业能动作用分析	151
三、合作行动中的政府能动作用分析	153
四、协会及其他第三方组织能动作用分析	155
第四节 佛山陈村花卉产业集群合作行动案例分析	157
一、陈村花卉集群合作行动类型演变	158